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 编 江建新 主编

纪念刘新园先生文稿



文物出版社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 编 江建新 主编

纪念刘新园先生文稿



文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纪念刘新园先生文稿 /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编.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 - 7 - 5010 - 4730 - 7

I. ①纪… II. ①景… III. ①刘新园 (1937 - 2013) -
纪念文集 IV. ①K825. 8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2031 号

纪念刘新园先生文稿

主 编: 江建新

责任编辑: 张小舟

责任印制: 梁秋卉

出版发行: 文物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邮 编: 100007

网 址: <http://www.wenwu.com>

邮 箱: web@wenwu.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5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0 - 4730 - 7

定 价: 160.00 元

本书版权独家所有, 非经授权, 不得复制翻印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江建新

副主编 邓景飞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万淑芳 江小民 李 慧 邬书荣 肖 鹏 邹福安 黄小铭

组 稿 李 慧 李子嵬

目录

CONTENTS

纪念篇

悼词	刘 陶 / 3
一本书、一个学者、一种研究	
——刘新园及其新著	尚 刚 / 5
忆刘新园	林梅村 / 13
追忆刘新园先生	刘朝晖 / 19
文人情怀 大侠风范	
——纪念刘新园先生	张小舟 / 28
瓷缘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与鸿禧美术馆合作展览纪实	舒佩琦 / 30
问学不迟	
——追忆刘新园老师	贺婉青 / 36
新园老师二三事	陈维康 / 39
从艾惕斯到范祥雍	
——忆刘新园老师	林 松 / 43
怀念新园	范邦瑾 / 45
我记忆中的刘新园	范邦菁 / 49
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	
——刘新园老师身上所展现的文人风骨	冯学锋 / 54
造化有何心 融结存妙理	
——记刘新园老师藏砚读砚二三事	方肖鸣 / 59

昼与夜的对话

——回忆刘新园先生 任志录 / 65

问道新园先生 郭学雷 / 71

抔土堆山绿无边

——忆刘新园先生 阎 焰 / 77

咽声吞泪哭恩师 孟树锋 / 82

千古文章 风范永存

——纪念恩师刘新园先生逝世周年 阮平尔 / 87

刘新园先生与我家三代人的友谊

——在刘新园先生追思会暨景德镇陶瓷考古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孙家骅 / 94

老友，你在哪？ 张 鑫 / 99

永远的怀念 雷瑞春 / 101

刘新园在陶瓷考古学上的贡献 周思中 / 105

世誉不睦惟仁为纲

——刘新园先生印象 舒宏瑞 / 111

梦里江河

——忆刘新园老师 于 坤 / 113

陶瓷学界的一代宗师

——纪念刘新园先生 江建新 / 116

从师傅到师父

——我记忆中的先师刘新园 江小民 / 122

学术篇

定窑烧造工艺两题

——忆刘新园先生访问定窑发掘现场 秦大树 / 129

中国水下考古所见的景德镇窑青白瓷 栗建安 / 145

明初青花料“苏麻离青”与“苏勃泥青”来源小考 梁寿子 / 157

金朝红绿彩美学：世俗文化源流考

——谨将《寒江独钓》献给我的师父刘新园先生 朱叶青 / 168

浅谈景德镇传统粉彩瓷源流及其存续现状 金 超 / 187

景德镇窑砖戳印纹字及相关问题初探 白光华 谢俊仪 / 196

浅谈永乐“甜白瓷” 李 慧 / 202

附 录

刘新园论文目录 / 213

岁月留痕

纪念篇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孫逸仙民宅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公布
江蘇省人民廳碑立

悼 词

刘 陶

2013年11月9日，星期六，阴。

父亲几十年如一日，一直保有每天坚持做日记的习惯。直到10月17日因病痛而不得已中断了日记。宋·释道原的《景德传灯录·利山和尚》记曰：“僧问：不历僧只获法身，请师直指。师云：子承父业。”遗憾我未能继承父亲的学识，如今只有以我的一篇日记来为他补叙他不在的这些日子的点滴心情与感悟。

今天，是父亲的丧礼。几乎所有父亲生前的亲朋好友，莫逆知己，还有曾经与父亲并肩共事的同事，弟子学生，以及他奋斗生活过的、挚爱的陶瓷发源地——景德镇当地的领导政要都赶来悼念。在此，我代表我的母亲、姐姐，还有父亲最爱的小孙子对您们这些天来的辛劳与关怀表示深深的感谢！

这几日，死亡似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主题。父亲的离去让我们深深地体验了死亡的残酷与悲凉。

父亲曾经给我背诵过的托尔斯泰的《伊万伊里奇之死》中的一段描写：“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小时，他感到自己跌进了那个漆黑的死亡的洞穴，看到绝望的满脸泪水的妻子和儿子，他忽然不再怜悯自己，而可怜起他们来，感到自己连累了他们。他想对妻子说些什么，但已无力说出来，他用目光指了指儿子说：‘领走……可怜……还有你……’忽然间，那些使他苦恼和不肯走开的东西，正从他的左右和四面八方立刻都走开了。他既然可怜他们，就应当使他们不痛苦。做到使他们，也使自己摆脱这些痛苦。‘多么好又多么简单啊！’他想。这时痛苦和死亡的恐惧都消失了，取代死的是一片光明。”我记得父亲在给我背诵这些的时候，他的声音是宁静的，目光深邃却又若有所思，他的样子甚至看起来似乎对此有少许期待。我想父亲的这一生是幸福的，他的

勤俭朴素，他疾恶如仇的性格，他刚正不阿的品德，对学术孜孜不倦的探索与钻研，对家人朋友、老师学生、同事的无私关爱，对生命的热情以及对死亡的豁然，正是因为他看清了生命中所有物质名利带来的快乐都是短暂而虚幻的。当他离开我们的那一天，他躺在那里，满脸安详甚至带有一丝微笑。我想此时他已经超越了动物性生命带来的所有痛苦，超越了死亡。向死而生，他用他内心中超越时空的，并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真正幸福，和经得起死亡考验的精神创造了一个不朽的新生命。

这些天来，我所经历的和目睹的悲痛，我相信父亲是不愿意看到的。我想他更希望看到的是他的思想与感情的结果开始生存，而且越来越有力地生存在今天在场的每一个人身上。

谢谢大家！

一本书、一个学者、一种研究

——刘新园及其新著

尚 刚

—

出于种种一言难尽的原因，以前，刘新园竟从未在大陆出版著作，二十年来，就连论文也绝少发表。但同时，他却在海外频频刊布著述、不断演讲学术，其研究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于是，其新作难见，便常被大陆学人引为憾事。如今，情况终于改变，这应当感谢江西美术出版社的努力。

刘新园之所以引人注目，当然首先在于其学术贡献。我的工作是中国工艺美术史（包括陶瓷在内）的研究和教学。由于这个学科的稚嫩，由于刘新园的出色研究和这个稚嫩学科至为密切的联系，所以，对他的学术贡献，我或许有比较特殊的体认。以下，想约略谈谈的，就是我所认识的在当代陶瓷史研究背景中的刘新园及其新著《明宣德官窑蟋蟀罐考》。

应当事先说明，刘新园此著本是篇讲演稿，原是给第八届波普纪念会写作的，纪念会于美国弗利尔美术博物馆召开，那还在1994年10月。约翰·波普为著作宏富、影响深远的美国现代东方学家，在中国陶瓷的学术史上，这个名字也极其响亮，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元青花就是从 he 开始的，著名的“至正型”也是由 he 提出的。1995年，讲演稿以《明宣德官窑蟋蟀罐》为名，由台北的艺术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还被译为英文先发表、后出版。如今，为江西美术出版社的大陆版，刘新园又做了不小的修改，主要是增写了关于鹰犬纹的讨论，添加了《清宫藏瓷不见宣德虫罐的原因》一节。

二

如果说，刘新园的工作有一个核心，那么，它显然是景德镇的陶瓷考古。倘若只从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成立算起，在这个元明清最重要的陶瓷产区，刘新园和他的同事也勤奋工作了近二十年。他们的工作虽艰苦而琐细，但成绩斐然，令人感佩。因为，至少人们知道，有权在景德镇考古的，不止一家，但唯独刘新园领导的研究所，以大大小小的残片，粘对复原出了上万件元明官窑瓷器（还有许多重复品，因库房狭小、不能存放而暂未粘对）。围绕这些科学发掘的出土物，十多年来，刘新园在海外刊布了大量深刻而绵密的论著。

刘新园何以被看重，一个基本的原因便是其研究的实物证据充足、可靠。这同拉扯出片断牢靠或不大牢靠抑或甚不牢靠的材料，发表些胡言乱语截然区别，也和随意牵引材料，做高屋建筑状，凌空驾虚地说“道”论“器”根本不同，而后两种轻浮的态度，不仅已在工艺美术史研究中风靡多年，并且，还在蔓延扩展。与刘新园辛勤著述同时，国内的收藏风气日盛一日。元明官窑瓷器是古董买卖的一大热点，于是，关于它们的鉴定论著也铺天盖地。有心人不难发现，那些论著大多陈词滥调充溢，稍好的，虽然编排巧妙，但实质言论却依然似曾相识。假如不考虑出版家、撰著者的商业动机、专业能力的话，资料的问题就是症结的所在：他们依据的实物大抵是传世品，这些传世品非但往往来历不清、时代难明，且数量也常常不多。

对研究而言，资料的准确至关重要。传世品常常浸染着造作时代欠准确的先天弊病，因为，从北宋末年开，中国制作里的仿古作旧便逐渐发展为专业，形成了传统，并且，时代越晚，摹仿的手段也越加高明，那些材美工良的精妙官府制作就是摹仿的重点。这样，传世品会在艺术价值往往较高的同时，还伴生着科学价值常常较低的缺陷。对研究而言，极其重要的还有资料占有的充分。一个常识无须证明，如若依据片断的资料，结论的客观也无法想象。

刘新园终归不同，以数量言，他和其同事粘对出的元明官窑瓷器远远超过今世公私收藏的总和，至于其品类之全，也令任何公私收藏无法比拟。这样，若以景德镇瓷器的鉴定论，刘新园的意见也一定比其他人更可信赖，而基于资料的差距和方法的区别，刘新园的结论常与他人有不小的出入，甚至截然相反。

仅以此著的资料为例。以前议论宣德官窑蟋蟀罐，实物资料不过寥寥数件，被刘新园引入讨论的则将近 30 件，不但数量相差悬远，且与通常所据为传世品不同，其核

心是得自窑址发掘的22件。如果只讲鉴定，刘新园也做了不少远比他人细密严谨的工作。比如，经过多角度、多层面的考察，他指出，坐盖式的蟋蟀罐制作在宣德元年至五年，平盖式则烧造于八年到十年。这个结论的获取及其可信性无疑是鉴定家难以梦见的。

说到底，刘新园的卓然成家，正在于他心存高远的学术理想，这使其工作比习见的鉴定学或艺术史研究高明得不可以道里计。而这个理想显然是捕捉行将消逝的历史信息，揭示器物与人、与时代的内在联系。

三

尽管刘新园的工作依靠着最充分、最可靠的实物资料，但是，如果止步于准确地描述它们，只配进行即令比“瓶儿高，罐儿低”高明，也必定有限的讨论，因此，其后继的工作便是对实物的全力解说。

以此著为例，为深入、全面地解说这些蟋蟀罐，刘新园大量引用了文献等其他资料。其中，不仅有正史、笔记，还有实录、政书、韵书、类书、别集等等。实录里，不仅有中国的《明实录》，还有朝鲜的《李朝实录》。一般研究古代陶瓷，所用图录多仅限于陶瓷，而此著引用的却大多是绘画图录。至于前人、时贤的直接成果和相关研究，更被作者一再称引。借助它们，刘新园分别判定了坐盖、平盖两式的烧造时间；认为传世宣德官窑蟋蟀罐是赏赐臣工之物；指出了器物年款和若干装饰粉本可能的作者，解说了宣德官窑蟋蟀罐不见于清宫旧藏的缘由等等。以我的见闻，在一般的艺术史或鉴定学论著中，这类讨论绝对新颖、绝对独特。

自不待言，引出这些讨论的依据，就在丰富的文献等其他资料。其实，同绝大多数陶瓷史论著比较，大量引证文献正是刘新园著述的又一特色。依靠这些资料，刘新园论证了许多重大的学术问题，如他建立起元青花同浮梁磁局以至蒙古帝王的联系^①，提出《陶记》并非出自元人之手，而是南宋著作^②，近日，又率先解说了元文宗时代的官窑瓷器^③。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由于一些羞于诉说的原因，早些年，他曾获罪

① 《元代窑事小考（一）》、《元青花特异纹饰和将作院所属浮梁磁局和画局》，《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第2卷第1期，67~78页、第3卷第1期，9~20页。

② 《蒋祈〈陶记〉著作时代考辨》，此文初发于《景德镇陶瓷》1981年第10期，5~35页。修改后，又被收入中华书局的《文史》辑刊第18辑，111~130页、第19辑，97~107页。

③ 《元文宗——图帖睦尔时代之官窑瓷器考》，《文物》2001年第11期，46~65页。

于少学多术的若干名人，于是，他的大量参证文献竟被斥为“迂回论证”，居然还引来了“蹈袭古人”的昏话。

为何必须引证大量文献？道理也真单纯：古代陶瓷都是某人或某些特定的人，在某个特定的背景下，为着某种特定的目的，选用某种特定的材料，采用某种特定的技术，为特定的某个人或某类人制作的。因此，不同的制作者、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目的、使用人不同的身份和喜好等等，都会招致作品造型、装饰、质料的种种差异。合格的陶瓷史研究应当认清这些差异，并竭力解说它们。而陶瓷毕竟无言，仅凭它，无从获取隐藏其中的历史信息，无法揭示器物与人、与时代的关系。

当年，在讲授历史方法时，洪业先生沿用其美国老师的教诲，要学生掌握五个W，即WHO（何人）、WHEN（何时）、WHERE（何地）、WHAT（何事）、HOW（如何）。以后，其弟子、已故的周一良先生执教，又加了一个更重要的W，即WHY（为何）^④。可以说，掌握了这六个W，历史问题就明晰了。然而，由于资料的限制，这在陶瓷等工艺美术史通常太难，但先求真，遇有可能，再去求解，总是份内之事。

所谓求真，即判别真伪、讲清哪个时代有什么、哪个名词指什么；所谓求解，即在求真的基础上，努力解说某种艺术现象的出现何以在此时，而非彼时，它何以是这样，而非那样。我相信，刘新园依靠充分且可靠的实物资料，再引证大量的文献史料，目的必定在此。

除了为求真、求解之外，看重文献史料的原因起码还有：时代悬隔，今见的实物在当时的地位、价值、意义如何，现在不可能全部明了；年代湮远，今见的实物绝不是古人创作的全部，难以说明陶瓷史上的更多现象。因此，文献既是解说实物的依据，又是补足实物欠缺的知识来源。特别是在史学传统优秀和文字记载无数的中国，文献将永远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于称引文献史料的必要，似乎早已尽人皆知。不过，该称引什么，却并非人人明白。所谓文献史料，主要指与所述议题同时或时代接近的古人的记载。之所以特地强调时代，全因为符合这样的史料通常更少三人成虎的弊病。可惜，一再有人表现出对此的茫然，尤其是在充溢市肆的各类鉴定论著里，所引文献竟大都出自明清的古董著作，哪怕议题是在此数百年前的艺术。尽管明清的古董议论也不乏真知灼见，但他们对唐宋古物的知识却不会多过今日。其间的道理实在简单，除去学术的积累以外，

^④ 周一良：《毕竟是书生》，20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

还有，今日的考古学手段他们绝不掌握。

另有一种现象令人骇怪：往往越爱滥引的作者就越爱轻松指责文献史料。其实，如同今人对眼前事物的议论也常有偏差一样，文献史料出现失误本无足奇，而今人的认识水平不高出古人反倒应受指责。毕竟千百年过去，今见的实物和文献不仅都必有遗缺，而且也难以一一直接对证。因此，有实物而无文献，不该苛责文献的疏漏，有文献而无实物，也不该指斥文献的虚妄。也因为今存的实物和文献都必有遗缺，所以，严谨深入的艺术史才应当由实物和文献共同构建，所以，艺术史研究才有意义，专家支薪领饷才有理由、学者交稿取酬才不惭愧。

近年，又新添了一种自残式的奇妙论调，说工艺美术史研究应该自有特点，不该用大量引证文献的历史学高标准来拘束。再清楚不过，如果乐意冠自己的研究以“史”，那末，就必须遵循历史研究的基本规则，一旦改变了这个规则，就该给研究另觅新名。就像是玩扑克牌，如果把“升级”的规则变易为“拱猪”，那末，牌戏的名称也只能从“升级”换成“拱猪”。倘若说工艺美术史研究自有特点，那末，就是应当比一般的历史研究更关注考古学和科技史。

我想，刘新园肯定赞同我的说法，因为，他早已做出表率，这不仅表现在实物和文献的充分、可靠，还反映于他对工艺和材料的深入研究。

四

陶瓷器必定是利用某种材料，又借助特定工艺制成的。因此，器物的美以及形式特点必定受到材料和工艺的制约，不同材料、不同工艺必定引出器物形式的变化。为准确把握古代陶瓷，合格的研究者理当充分了解材料特点和工艺条件。与绝大多数陶瓷史家不同，对此，刘新园有充分的了解；同少数充分了解这些的陶瓷史家区别，对此，刘新园有深入的研究。从艺术史的角度关注并研究制作工艺和材料，显示的自然是刘新园识见的深宏，学术的广博，而其研究大多具有开创性和启发意义。

二十年前，刘新园便已成名。在其早期论文中，就包括了探讨制作工艺和陶瓷材料的篇章。我以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篇是《景德镇湖田窑各期典型碗类的造型特征及其成因考》^⑤和《高岭土史考》^⑥。

^⑤ 《文物》1980年第11期，50~59页。

^⑥ 《中国陶瓷》1982年第7期，141~182页。此文与白焜合作。

前一篇从生产者的工艺条件和作坊主的经济利益、需求者的实用和审美要求，考察了由五代至明的六种碗盘类器物的造型变异，指出，在这四者之中，工艺条件最为重要。此文中，刘新园着力尤多的是装烧，因为，多年的研究令他确信，在涵盖了原料的选择与制备、成型、装烧、烧成等多环节的工艺因素中，装烧对造型的影响最巨大、最直接。在文章发表的年代，讨论造型的流行角度是审美，若干艺术史家正痴迷着对形式因素的分析，但说来说去，不外那么几个公理式的原则及其浅近的引申。刘新园的结论真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令那些艺术史家突然醒悟，原来导致造型变迁的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居然新的工艺能引来新的时尚。如果追溯，此文的一部分已经刊布于6年以前，即《景德镇宋元芒口瓷器与覆烧工艺初步研究》^⑦，近日，还有考古学家向我谈起它的启发意义，而附于文中的支圈组合式匣钵的覆烧工艺线描示意图，直至今日，仍在被陶瓷史论著一再引用。

《高岭土史考》是篇在地质等自然科学会议上宣读梗概的长文，总约4万字。文中，刘新园不但从原料的变迁及官府对原料的控制，讨论了景德镇10至19世纪的制瓷业的盛衰、高岭土名称的历史变异，又专门研究了不同原料的物理、化学特性和它们对瓷器质地的影响，还从万历至乾隆时代高岭土矿遗址现存的尾砂数量，参以丰富的工艺知识和大量文献史料，推算了那200年间景德镇所产瓷器的总重量。可惜，发表此文的刊物不大著名，故文章的知名度也不甚高。因此，近年还上演过一幕闹剧：在一次国际讨论会上，大获赞扬的某公“论文”竟是《高岭土史考》的部分不很准确的摘要。

其实，对制作工艺和材料的密切关注和深入探讨，几乎贯穿在刘新园所有的论著里。近例就有，在研究宣德祭红釉时，他讨论了祭红釉和寒水石的关系，为此，特地就教于精于仿制的著名老艺人，并检索过20世纪50年代献给国家的民间配釉秘方等，又参证了《明实录》和《本草纲目》^⑧；他研究元代孔雀绿釉瓷器同波斯陶器的亲缘，不仅从釉色的相同出发，更以丰富的工艺知识，根据化妆土的使用，证明了蒙古族上层喜爱伊斯兰文明的深挚^⑨。

⑦ 《考古》1974年第6期，386~393转405页。

⑧ 《景德镇出土明宣德官窑瓷器》175~176页，鸿禧美术馆，台北，1998年。

⑨ 《元文宗——图帖睦尔时代之官窑瓷器考》，《文物》2001年第11期，59页。